

和拳毛騧两骏，把它们幽禁在美国费城博物馆，大海彼岸的两骏不得不与其他经修复珍藏在陕西省博物馆的四骏隔海相望了！

何必只是敦煌石窟，遍布我国北方的许多石窟，如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济南千佛山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和义县万佛堂等，莫不都遭到外国盗宝者的破坏和盗劫，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例，较小的佛像十之八九都失去了首级，而石窟中著名的壁画，两块“帝后礼佛图”，则被盗到外国。

何必只是昭陵六骏，汉丰魏晋时葬在辽阳北郊太子何左岸的大型多室壁画墓群，辽朝葬在内蒙巴林右旗境的帝陵，不是一一都被侵华日军所破损？！

何必只是《永乐大典》，汗牛充栋的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包括私家文集，地方志书，甚至是家乘、谱，从孤本秘籍到少数民族资料，无一不是外国盗宝者的兴趣所在。日积而月累，以至大量的中国文化典籍流失到国外，成为伦敦、巴黎、华盛顿、柏林、东京……等图书馆的珍藏。一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某位负责人曾经大夸海口的说：“要研究中国学问的，恐怕将来都要到美国来”，不信么，现实就是这样的严酷，我国著名的方志学朱士嘉，积毕生之精力汇编一部中国地方志书的目录，取名《中国地方志综录》，在这部《综录》编成之前，朱士嘉就先编成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共著录方志 2939 种，其中稀见的十几种，据说中国的地方志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的特藏之一，至于其他美国的名大学的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劳动保护坦福、华盛顿等，莫不各藏中国地方志书千百种，合计共达五千余种，其中不乏我国国内久已失传的珍本。

其他欧洲的英、法、德、意、俄、比、荷、瑞典等国，也都馆藏着中国的地方志书，据吴德明《欧洲各国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所列共是 2590 种。这还没有包括特别着意搜求中国文

化典籍的东邻日本所藏的大量中国地方志。

至于私人文集的流失也大体如是，兹不赘书。

在星移斗转的今日，整理这些国宝昔日厄运的旧帐，那怕是一些一鳞末爪的段落，卦一漏万的零量碎语，或者它将从一个人们不太熟知的方面向人民和青年展示这凄惨辛酸、催人泪下，不能忘记的过去！面对这些旧帐，炎黄子孙不能只沉浸在对过去的扼腕叹息中，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本旧帐激发人民和青年深沉的反思过去，热切的追求未来！

注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③斯文侯：《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

④泰国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导引》

⑤郭伯衡：《文物漫话》

⑥《后汉书》班超传

⑦⑧⑨⑩英·彼得·霍普科克《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

十七 中国在列强经济掠夺中承受的苦难

作为中国屈辱历史开端的鸦片战争，是一场资本主义列强利用其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的侵略战争。英国发动这场战争，就是为了倾销它的商品，掠夺中国资源，攫取侵略权益。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如此，嗣后列强发动的一系列对华侵略战争，其目的也莫不如此。一次次战争的失败，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而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残暴的殖民掠夺，一步步地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大致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以商品输出为主，后一个时期以资本输出为主，各具特征。

（一） 甲午战前列强的盘剥

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美等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不断攫取政治经济特权，它们强迫中国在沿海开放了许多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制订了极低的协定关税，劫取了沿海贸易权。随后，内河航行权与内地通商权也被掠夺，内地也开辟了通商口岸，外国侵略者可以长驱直入，深入中国内地。这些大大便利了外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它们不仅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把中国作为商品销售市场，而且还加紧掠夺中国的农产品，把中国作为原料产地。

为了便于向中国输出商品和掠夺中国资源，在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家开设了商行（洋行）、银行和工厂，作为其对华进行资本输出的据点。据估计，到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大约有2—3亿美元。^①

⑫于素云等著：《中国近代经济史》，第215页。

（刘枞堂）

十八 列强在华势力范围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列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其中，沙皇俄国最先伸出了侵略魔掌。

沙俄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里，沙俄的资本主义经济虽有了长足发展，但在国际仍无法与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开展竞争。因此，它特别看重武力。想通过武力扩张在国外的殖民势力。此间，沙皇政府的主要决策人、财政大臣维特曾公开宣称：“俄罗斯帝国究竟靠什么支持呢？不仅主要是而且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军队。是谁创造了俄罗斯帝国，把半亚洲式的莫斯科王国变成最有影响、最有决策力量的欧洲大国呢？只有军队刺刀的力量。世界并不是拜倒在我们的文化面前，不是拜倒在我们的官僚派头的教会面前，也不是拜倒在我们的财富和繁荣面前。世界只是拜倒在我们力量的面前。”^①为了同其他列强争夺远东和太平洋霸权，沙俄于1891年开始修筑西伯利亚铁路。随后，为了排斥日本独霸中国东北，沙俄又一手导演了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其中规定清政府将辽东半岛割让日本。由于这一条款直接妨害沙俄独占东北野心的实现，立即引起沙俄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对。《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俄国政府正式向法、德两国建议，三国联合劝说日本退还辽东半岛，若得不到允准，即对日本从海上进行共同军事行动。4月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奉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劝其退出辽东半岛。三国海军也同时游弋日本海面进行示威。日本自然无力与三国同时开战，便急忙转向英、美二国求援。然而，英、美既不愿开罪俄、法、德三国，也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过分膨胀的局面，都劝告日本接受三国的要求。日本孤立无援，只好忍痛吐出已到口中的肥肉，把辽东半岛

退还，而向中国索取三千万两“赎辽费”作为补偿。沙俄的干涉还辽，本来是处于霸占中国东北的野心，事后它却恬不知耻的把自己美化为中国的大恩人，向清政府索取报偿。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给日本赔款二万万两。其中，应于1895年11月8日交付五千万两，六个月后再交付五千万两。其余一亿两如能在1898年5月8日前全部交清，可免押五厘的利息。后又增加三千万两的“赎辽费”，清政府当时的财政收入全年不过八、九千万两，倘不举借外债，根本无法交付如此巨额款项。于是，帝国主义利用清政府的财政困难，争揽借贷权。在这当中，沙俄伙同法国以“干涉还辽有功，应有报酬”为由，迫使清政府于1895年7月6日签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四亿法郎，年息四厘，按九五弱折扣付款，偿还期限为三十六年。除借款以海关税担保外，还允许沙俄参加中国海关行政管理，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沙俄在华势力。在签订四厘借款合同以后，沙俄又诱使清政府于1896年6月与它签订了《中俄密约》，即《御敌互相援助条约》。

三国干涉还辽后，慈禧李鸿章等人对沙俄产生了好感，希望“联俄制日”。俄国便乘机引诱清政府钻入自己的圈套。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拟派布政使王之春前往彼得堡致贺。但是，由于俄国想借此机会与清政府秘密谈判，认为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指名要李鸿章前往。于是，清政府便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命其赴俄参加沙皇加冕典礼，并前往英、德、法、美四国访问。4月30日，李鸿章被俄国专使迎往彼得堡，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给予最隆重的礼遇。5月3日，李鸿章开始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及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秘密谈判。一个月后，6月3日签订了《中俄密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地区或中国以及朝鲜，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非由两国商议，一国不能独

十九 袁世凯善后大借款的政治交易

财政金融正如一个国家的血液和命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地控制，至 19 世纪下半叶，逐渐由传统的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以期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特别是当中国铁路建设开始起步，急需大量资金的时候，列强之间争相降低对华贷款条件以期争夺利益最为丰厚的中国铁路让与权。由于借款数额巨大，互相竞争又容易损害相互的利益，于是列强之间经过反复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筹划成立了国际银行团。加盟银行团的国家，最初只有三国，逐渐扩展到四国，最后组成了英、法、德、美、日、俄等六国银行团。国际银行团通过贷款方式，从中国攫取各种特权，损害中国利益。著名的辛亥革命，就是因为湖广铁路借款而激起了保路风潮，最终引发起来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在“金融中立”的幌子下，积极准备对实力人物袁世凯提供财政经费。于是列强对华借款就触及到中国政府最敏感的政治中枢神经。对华资本输出由传统的实业借款转而为主要经营政治借款。当时日、俄尚在银行团之外，但由于政治贷款的诱人前景，以及各自私欲利益的牵制，也参与了对华贷款的谈判。袁世凯亦希望银行团能够协调各列强关系，以求列强共同维持其初建的统治，并使列强内部由于利害冲突而互相牵制。

1912 年初，内阁总理唐绍仪开始主持借款谈判。考虑到中国财政善后需要款项巨大，唐绍仪拟议实施善后大借款。当时，中国政府急需 700 万两银子，主要用于南京政府方面遣散军队以及偿还债务之用。四国银行团为了支持袁世凯稳定政局，同意在 3 月份内向南京政府方面提供 700 万两作为军事善后之用。首批 200 万两垫款 2 月底兑现，以中国轮船招商局船只作为担保。同时唐

以南一线，以表示华军停战的决心，请日军不再前进；（二）于五日内，日方（指关东军）派遣代表与华北军事当局（指军分会）讨论停战条款；（三）正式谈判地点须在日军占领地内。当日中午，徐燕谋带着日方的条件回北平报告了接洽的情况，焦急万分的何委员长才长长舒了一口气。何应领随即决定派军分会参谋部厅长熊斌（此公也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与日本军方有过交往）与日军代表谈判；同时派黄绍竑去庐山向蒋介石当面详细汇报。27日，黄绍竑到达牯岭，向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等报告了与日方谈判情况。蒋介石听完报告后连声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①汪精卫、孙科亦无异议。第二天，蒋汪联名发出“救国必先剿共”的通电。原来，蒋介石、南京政府之所以不能抗日，是因为共产党在“捣乱”。果真是这样吗？历史早已作出了回答。

5月30日，中国军方代表熊斌与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仓库楼上会谈。冈村宁次一坐到谈判桌上就首先指责中国军队在大沽口及沿岸配备军事设施，违反《辛丑条约》，且与停战不符，应立即撤除。熊斌丝毫不敢争辩，立即连声唯唯表示接受。5月31日，日方提出协定条文的正式草案，中方代表仅作文字上的商榷，无人敢改动主要内容，即行草草签字。冈村宁次看着中方代表，哈哈大笑地说道：“你们无需斤斤注重文字。这系日本愿与中国停战，否则皇军可随时前进。你们知道吗？”^②这就象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时，日方代表对清政府代表李鸿章说：对条约草案只能在“允”或“不允”之间选择。历史又在这里重演。中方代表熊斌等人听后面色惨白！作声不得，是气？还是惧？受此侮辱，恐怕终身难忘。一个弱国的代表、一个对外妥协成性的政府的代表是免不了被外人欺辱的。从当时签字后中日双方合影的照片上可看出一方面色沉凝，紧锁眉头；一方却面含微笑，得意飞扬。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附件《觉书》就这样签订了，其主要内容有：

“（1）中国军队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县、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以南一线，今后不得越过该线前进，又不得作一切挑战扰乱行为；”

“（2）日军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及其它方法，视察实情，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予以便利；”

“（3）日军确认中国军队已撤退至第一项协定之线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撤归长城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觉书》的内容是：“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③

这个协定，可说是继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之后最大的卖国条约之一。这不只是协定所用的诸如“挑战”、“扰乱”、“不再追击”等侮辱中国军民的词语，为一切热血的中华儿女所不能容忍，而且其实际内容给予中国的损失更是极为巨大。例如第一项规定，中国军队从此项所“协定”撤退后，再“不得越过该线前进”，这等于说，中国承认永远不能收复东北四省失地；“协定”第三项规定，日军“自动撤归长城线”，这就无形中承认长城线为伪满洲国国界；又如第二项规定，日本“可用飞机及其它方法视察”中国军队撤退及以后的情形，这就可以作为日军日后进攻华北、囊括平津的借口。《塘沽协定》的签订使冀东逐渐变成了“满洲国”第二，并使华北置于日军监视和控制之下，为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提供了方便条件。日本帝国主义是从来不受协定、条约束缚的，它签订此“协定”无非是迫使南京政府正式承认其既得的侵略利益罢了。

事实上，《塘沽协定》刚刚签订，日军就趁此之利向察哈尔进攻。6月1日，日机轰炸独石山，4日侵占宜昌。8日陷康保，妄

所溜走；有的不辞而别；负责邀约舞伴的章明月亦于此时悄悄离去；但洋人兽性更为猖獗，一名美军军官竟将叫曹秀兰的内衣、短裤扯破；此时，舞场电灯突然熄灭，乐队人员溜走，妇女纷纷寻路逃跑，惨叫声、呼叫声、淫荡声不绝于耳；曹秀兰拼命挣扎，才从后楼“太平梯”跑脱。

当夜12时许，侥幸逃出虎口的巧巧（歌女）找到未及逃出的莎莉家里，同莎莉的母亲一道，将她经历的情况告知汉口市保安警察总队分队长方向，再由方向转报鄱阳街管段的汉口市警察局六分局；再由该局局长苏天纯请示市警察局局长任建鹏后，派分局巡官马步云带了几名警察前去侦察。

当马步云等人到达景明大楼，并准备作例行检查时，遭到了洋人的阻拦，不准上楼；又经过几次反复地请示、联系，侦察人员才上到五楼；此时已是8日凌晨3点左右了，现场上仅剩下列富和乔治·林肯。两人强作镇静，始终不吐实情，只说是一场“送行舞会”已经结束。然而，他们那副兽性刚过的神情以及地上和沙发上的衣裤碎片、遍地烟蒂、画牌等等，也正说明一场混乱刚刚过去，他们还未及收拣整理。警察局的侦查人员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草草收兵，怏怏而归。

但是，毕竟还有那么多有良知的中国人。8月8日，汉口的一家晚报首先把这个“事件”公开披露出来，全国各报社驻汉记者也就此向全国各地报道了这条新闻，消息全面传开。从8月9日起，武汉10多家大小报纸接连不断地发出消息，写评论；武汉的街头巷尾、茶楼酒馆，几乎人人议论，无不哗然。全国民众和广大海外侨胞，更是怒火万丈，纷纷发来函电，一致谴责帝国主义，要求国民党政府当机立断，严惩罪犯，维护国体。

令人遗憾的是，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尽管群情激愤、民怨沸腾，而国民党政府却一直表示沉默，深怕事态扩大，影响了“中美邦交”，一面暗中派人向新闻界疏通，希望“顾全大局”，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一面传讯几个中国从犯和受害者，应付门面，嫁祸于人。

至于肇事的主犯——利富和菲籍乐师赛拉芬，早已在“事件”揭露后不久逃往香港；而美军人员和所谓美、英侨民那伙禽兽不如的强奸犯，则一直逍遥法外；甚至重要组织者之一的菲籍乐师克劳兹，仍然若无其事地安居武汉，谁也不曾过问。

更为荒唐的事实是，强奸犯陆惠人（美孚公司职员）竟反咬一口，于8月12日写信给国民党汉口市警察局长任建鹏，胡说什么：“该项舞送会，全系私人性质。惟查8月9日至8月13日汉口华文报章所载各节，核与事实不符。是否因到会之舞女与邀请彼等参加之乐队领袖之间，对于付给之舞资发生问题，致使舞女方面因在外报告失实耶。”反而倒打一耙，大口大气，俨然太上皇下达旨意一般。

在紧锣密鼓的社会压力之下，国民党汉口市参议会，于8月25日，以“为景明大楼跳舞强奸案请彻查严办并禁止假借任何名义举行舞会由”给汉口市政府去了一纸公函；整整过了二十五天，汉口市政府就将汉口市警察局的一份《侦察报告》复转参议会，搪塞了事。这就是所谓“民意机关”对这一“事件”的关心。

这个喧嚣全国的“事件”，究竟怎样了结呢？国民党汉口市地方法院延至1949年4月1日才作出“判决”，如此大事，如此敷衍了事。《判决书》的“主文”是这样写的：

“主文：章月明、杨玉麒、刘宝山、曹秀英、章继宾等共同意图营利，引诱良家妇女与他人奸淫，章月明、杨玉麒各处有期徒刑三年，褫夺公权三年；刘宝山、曹秀英、章继宾各处有期徒刑一年，褫夺公权一年。”

“判决”宣布，顿时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全国舆论纷纷抗议，公开指责。在宣判的第二天，汉口《新湖北日报》新报道的标题是：“洋犯人一走了之，辱国案草草终场”，并在一

则《短评》中说：“难道洋大人强奸了中国女人，却让中国男人坐牢是我们的‘国体’吗？如此‘维护国体’究是维护哪一国？法官执法，必有所据，小百姓愚昧，尚盼明教。”这就是当时武汉人民对这一重大辱国事件的客观评价。

（王才忠）

著的息烽集中营，许多人宁愿挨一刀一枪了结性命，也不愿到息烽受长期的折磨，而特务们偏偏要使尽一切残酷的办法，将活人慢慢地折磨死。在这深山峻谷中的人间魔窟里，许多被囚禁的人被折磨成浮肿，夜盲、瘫痪、风湿、心悸、肠胃病、神经失常，记忆力衰退，严重地摧残了人的身心健康。许多革命志士在这里惨遭屠戮。

“中美所”通过举办特训班，将许多比较单纯的青年诱骗下水。青年们进入了特训班的大门，个人的一切自由和人生权利便被剥夺了。受训特务进集训班不久，便举行一次集体宣誓：“我誓以至诚参加团体，服从领袖，严守团体秘密，服从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戴笠还规定特务纪律，“生进死出，活着进来，死了算出去”。特务们必须死心踏地地为蒋介石和戴笠卖命。进了特训班，无异于签了卖身契，谁也无法自拔。有的青年因无法摆脱这种处境。积怨含恨，苦闷悲观，最后自杀身亡。

“中美所”里堆满了中国人民的累累白骨，“中美所”的罪恶罄竹难书。

（傅迅生）

尾论：中国近代匡救国运、洗雪国耻 的斗争

一、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忧患意识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不仅敲开了关闭了数世纪之久的国门，而且唤醒了国人对外部世界以及自身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最早感受到这种世纪末似的危机的是近代一些早期启蒙思想家如龚自珍、魏源诸先贤。嘉、道年间，面对国势衰微、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威胁日益增加、鸦片入内、白银外流，社会危机日益加深、龚自珍就发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沉重喟叹！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忧患意识更加明显，许多仁人志士已经认识到中华帝国已经历着自古未有之“变局”：“历代备边多于西北，近来边防移在海疆，群类磨我腹心、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周盛传语），李鸿章在1874年《筹议海防折》中亦谓：“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磨集京师及各省腹地，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定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甲午战争以后，面对一个“尔小国”打败泱泱天朝大国的尴尬危局，近代仁人志士的亡国忧患意识更趋沉重。梁启超在这一时期写了大量文章，从世界大势、亚洲大势视野，指出中国被国际帝国主义豆剖瓜分的危险局面，他沉痛地抒发自己的亡国隐忧：“独恨蹉跎卧榻，鼾睡已属人；沈沈昆明，妖灰米苏前劫。举目有山河异，谁泣新亭；中原无颇牧之才，空肥戎马。对图搵泪，掩卷惊神。向天意其苍茫，哀民生其憔悴”（《中国地理大势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严复更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因国势衰弱而面临亡国灭种的局面提出警告。他的《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政论都是“醒世诤言”。他翻译